

剪除两元首特大奇案

时延春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一国元首被炸身亡,是为大案,两国元首因同一阴谋相继亡命,则可谓奇案。我耳闻目睹过这类案件,是我外交生涯中的一段独特阅历。

20世纪70年代是颇具特色的年代,那时国际风云急剧变幻,主要表现在美苏两霸在全球争夺霸权,在国际舞台导演了一幕幕血雨腥风的闹剧。那时,中东、红海地区和亚丁湾是美苏争霸的重点地区,发生在那里的重大国际事件不绝于耳。位于红海和亚丁湾之滨的南、北也门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漩涡,演出了一场历史闹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生在1978年7月一箭双雕除掉南、北也门两位元首的国际阴谋。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苏在中东地区展开了激烈争夺。进入70年代后,在这一带的政治地图上,美苏争夺的色彩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尤其在埃及和索马里发生的变化为最。

在埃及,纳赛尔执政时期,偏重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其反帝斗争的盟友。萨达特执政后,埃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1972年7月,萨达特下令驱逐在埃的苏军事专家,1974年,决定同美国恢复关系,开始接受美的援助。1976年3月,萨氏宣布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在萨氏疏远苏联的同时,却密切了同美的关系,曾多次访美。1975年9月,在美国的调解下,埃及与以色列签署了有关脱离接触的协议。1977年11月,在美支持下,萨氏前往耶路撒冷,同以当局会谈,成为访以的第一位阿拉伯国家领导人。1978年9月18日,萨氏又同以总理贝京、美总统卡特在美签署了戴维营协议。随着埃美关系的不断升温,埃苏关系逐渐变冷。在美苏争夺埃及的较量中,美国由劣势逐渐转为优势。

地处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北临亚丁湾,东濒印度洋,西接非洲大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1960年,索马里宣布独立,成立了索马里共和国后,美苏都在觊觎这块非洲土地。1969年10月,索马里领导人西亚德宣布在索实行“科学社会主义”,“建立一个平等、团结的社会主义社会”。1973年10月,西亚德宣布要按“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建立新型政

党。1976年7月,西亚德宣布建立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由他任该党总书记,并兼总统和政府总理两职。这一时期,西亚德及其领导下的索马里与苏联的关系密切,签有友好合作条约,接受苏的援助和军事顾问。1977年后,索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1977年11月,西亚德宣布废除索苏条约,赶走苏在索的顾问和专家。与此同时,开始与美国发展关系,接受美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美遂成为索最大援助国,到1987年为止,美向索提供近10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显然,在美苏对索争夺中,美又从苏手中夺走了索马里。

埃及与索马里对美苏关系的变化使苏忧心忡忡。在苏看来,进入70年代中叶,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的上空笼罩着一片乌云,而地处这一地区的北也门总统加什米的民族主义意识虽很鲜明,但与苏联的关系却已趋冷。半岛南端的南也门负责人鲁巴伊谋求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倾向愈益明显,与亲苏的伊斯梅尔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同时,南北也门间的关系也由冷淡转向恶化,两国的局势发展使苏深感不安。如何稳住南北也门,免使两国重蹈埃索覆辙,已提到苏联克格勃乃至苏最高领导层的议事日程。

加什米1941年生于北也门首都萨那以北的达拉埃村的哈希德部落中的哈姆丹家族,从小受传统的伊斯兰教育,是虔诚的穆斯林,属什叶派中的宰德派。加什米小学毕业后,在萨那读完中学,便进入塔兹军事中心接受军事训练,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从装甲军事学校毕业后,成为北也门军中的一名低级军官。

1962年9月26日,北也门推翻王室政权的政变成功,成立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下称北也门)。新诞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挑战。加什米一家坚决支持北也门共和制,他和父亲、兄弟都参加了反对王室势力企图复辟的斗争,为保卫共和制做出了贡献。后来,加什米被派往塔兹军事中心深造,逐步晋升为高级军官,先后担任过装甲营营长、团参谋长、装甲旅旅长、军区司令等职。

1967年9月到1972年4月,我在中国驻北也门大使馆任职。其间,我曾有机会与加什米多次见

面晤谈。一次,我们应加什米的邀请,专程到他家乡做客。加什米一家对我们非常友好,他本人言辞恳切,对我们以诚相待,怀有真挚友谊。他说,北也门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爱戴友好之情,这种友谊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行动赢得的。他举例说,中国向北也门提供了大量援助,但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也门内政;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品质高尚,工作勤奋,质量有保证,受到北也门各阶层人士的赞扬;中国人民与北也门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一贯支持北也门人民的正义斗争,尤其在著名的萨那保卫战,唯有中国大使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在萨那与北也门人民一起战斗,北也门人民对此永志不忘。加什米的哥哥穆罕默德热情豪爽,言语不加雕饰。我们在他们部落参观访问时,由他全程陪同。他对那些朴实的贝都因人说,在我们心目中,来访的中国朋友都是天使。《圣训》中有句名言说,求知远在中国,亦应前往。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创造了人间奇迹。中国对北也门的援助和支持给北也门人民带来幸福和进步,北也门人民对此表示敬佩和感谢。加什米全家杀鸡宰羊,盛情款待我们,还送了一些土特产。在那段时间里,我们过往甚密。1972年4月,我离任回国前,穆罕默德专程到使馆为我送别说,他弟弟加什米在外地执行公务,一时不能回萨那,由他代表为我送行。穆罕默德还专门送给我一袋他家乡的核桃做纪念,让我永远记住他们一家。

加什米工作勤奋,才能出众,在军中的地位不断上升,1974年6月13日被任命为握有决策权的全国指挥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22日,升为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1975年4月29日,又升为武装部队副总司令兼总参谋长,成为北也门政治舞台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人们称他为北也门第二号人物。

1977年10月11日,北也门元首、军队最高统帅哈姆迪遭暗杀身亡,加什米登上国家元首宝座,出任指挥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1978年2月6日,加什米公布了一项宪法宣言,决定成立人民议会。同年4月22日,人民议会决定解散指挥委员会,确定国家实行共和国总统制,总统为国家元首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加什米被选举为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

加什米执政期间,奉行中立、不结盟、反对外来干涉的对外政策。他强调,北也门遵守联合国宪章、阿盟宪章和不结盟会议决议,改善同支持阿拉伯事业国家的关系;在中东问题上,坚持以色列必须从全部被占领土撤出,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在中东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致力于加强阿

拉伯国家的团结,共同对敌。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受国际形势和南北也门关系等多方面的影响,北也门与苏联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也门与苏联的关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一战后,奥斯曼帝国宣告解体,也门独立,建立了穆塔瓦基利亚王国,叶海亚任国王和最高伊斯兰教领袖。苏联率先承认穆塔瓦基利亚王国政权,并于1928年11月与也门王国政权签订了苏也《萨那条约》。长期以来,该条约一直被视为也苏关系的基础和指导方针。1962年9月26日,也门北部推翻王室政权,建立共和国后,当时的萨拉勒政府为巩固新生政权,又受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影响和制约,主张与苏联积极发展关系。但自70年代中期,北也门与苏联间的关系开始变冷。1976年6月,加什米担任武装部队副总司令兼总参谋长时就开始指责苏联有意停止对北也门的援助,对苏拒绝向北也门提供飞机和坦克所需零配件表示不满。加什米执政后,公开宣称北也苏军事关系已经冻结,表示北也门将试图从西方国家寻求武器。加什米的这些言行引起莫斯科的警觉。

当时南也门的国家元首是鲁巴伊。他1934年出生在南也门阿比洋省南部专区马哈尔村一个农民家庭,从小从事拔草、摘棉花、放牛羊等农活,养成憨厚、朴实、忠诚和吃苦耐劳的品质。

那时的南也门处于英国殖民主义和地方酋长、教长的统治之下,人民生活十分困难,鲁巴伊的家乡也不例外。鲁巴伊在本地读完小学和初中后,到哈达拉毛军校受训半年,先在阿比洋省南部地区当小学教员,后在该省东部地区任民事法典说明官。在工作和社会实践中,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群众,耳闻目睹了他们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情景,在他的心灵深处产生了巨大反响。他为南也门人民的未来着想,决心推翻英国殖民当局和当地封建政权的统治,改变南也门贫穷落后状况,青年时代起就参加了革命斗争。他曾被捕入狱,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60年,鲁巴伊加入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1963年,被占南也门民族解放阵线成立时(下称解阵),鲁巴伊是该阵线的第一批成员。

1963年10月14日,解阵领导南也门人民在拉德凡山区打响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第一枪。1964年,鲁巴伊投入山区的武装斗争,不久晋升为支队长。1965年初,他受命潜入亚丁城,为在城区开展武装斗争做准备。他成功地在亚丁机场组织了第一次游击活动,对英国守军震动很大,也大大鼓舞了解阵领导下的游击队员。解阵总部遂任命鲁巴伊为亚丁地区游击队司令,当选为解阵总指挥部成

员。在战斗中，他英勇善战，转战南北，接连取得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英国殖民主义占领军，他的名字传遍各个游击战区，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与解阵的一位重要人物。

1966年1月23日，解阵在北也门的边界城镇吉布拉召开了第二次大会，鲁巴伊作为解放军领导人出席，当选为最高指挥部成员，在解阵决策机构的发言权日益增多。同年11月25日，在鲁巴伊的提议下，解阵在北也门胡木尔召开了第三次大会，鲁巴伊继续当选为总指挥部成员。1967年8月27日，鲁巴伊被任命为中部地区司令，负责指挥阿比洋、加阿尔、达西纳等地区的战斗，并作为解阵代表负责这些地区的政治工作。1967年9月，他领导的解放军解放了阿比洋省，为结束英国在南也门长达129年的殖民统治做出了贡献。

1967年11月30日，南也门宣布独立，成立南也门人民共和国，鲁巴伊任阿比洋省中部地区解阵和人民卫队负责人。

1968年3月2~8日，执政的解阵在南也门阿比洋省的津吉巴尔召开第四次大会，鲁巴伊继续当选为解阵总指挥部成员。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制定南也门独立后的内外政策，确定独立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与会代表在国家发展方向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以鲁巴伊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派，同以解阵总书记、首任总统沙比等人为代表的温和派，展开了激烈斗争，结果激进派占多数，通过了有利于激进派的声明和决议。温和派对会议结果不满，即利用手中军权对激进派发动突然袭击，于1968年3月20日逮捕了大部分激进派代表人物，鲁巴伊逃回家乡阿比洋省，组织反对温和派的活动，因力量悬殊而退入山中打游击，被称为“上山派”。

此后一段时间，鲁巴伊等人无力打回亚丁，执政的温和派也无力肃清“上山派”，双方形成对峙。鲁巴伊等人常到萨那寻找支援。1968年夏，他趁在萨那的机会，与一位叫安塔尔的军人拜访了中国大使馆，我参加了接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鲁巴伊。

在那次会晤中，鲁巴伊向我们介绍了南也门的内部斗争情况，并寻求支持。我们主要听取他的介绍，阐述了中国支持南也门人民的正义斗争，但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立场。鲁巴伊留给我的印象是身躯高大，深沉果断，憨厚朴实。

陪鲁巴伊来访的安塔尔身材短粗，穿一双军用胶鞋，一进接待室，就脱下鞋，将一双赤脚放到茶几上，背靠沙发，偶尔插几句话。安塔尔是南也门的一位传奇人物，在山洞里出生，在苦水中长大，是第一批加入反英武装斗争的战士。他打起仗来八

面威风，威震四方，被人称为南也门的伏龙芝和夏伯阳。后来他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回国后任要职，曾任国防部长多年，任过南也门最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相当于副总统）。1986年1月，在南也门最高决策层内讧中身亡。

在那次会晤后不久，我在萨那机场又与二人相遇，我们像老朋友一样互致问候，热情交谈。

1969年6月初，南也门温和派总统沙比与内政部长海塞姆发生矛盾，鲁巴伊、安塔尔等人借机返回亚丁。他们一面观察事态发展，一面为夺权做准备。同年6月22日，他们联合激进派其他人士发动纠偏运动，实是一场政变，推翻了温和派政权。解阵总书记、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沙比被抓，作为沙比智囊人物的费萨尔总理被打死。政变后，鲁巴伊出任总统委员会主席，开始了他长达9年的国家元首生涯。同年6月27日，解阵领导班子大改组，伊斯梅尔任解阵总书记，鲁巴伊任副书记。

伊斯梅尔与鲁巴伊联合执政后，为稳定局势，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这些措施无不带有激进色彩。在此基础上，实施了三年计划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南也门最高决策层的分工，鲁巴伊主要抓三年计划和五年计划及国内经济等重大事务，伊斯梅尔负责意识形态和解阵建设。

伊斯梅尔于1939年7月28日出生于原北也门塔兹省哈贾里亚地区的埃什阿布村，在亚丁读完小学和中学后，一直在亚丁工作。18岁时，在亚丁炼油厂工作时就开始了政治斗争，后从未中断过。他是南也门一位重要人物，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度过一生。他自诩为也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南也门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和实践者。伊斯梅尔与苏联关系密切，先后访苏10余次，极力主张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苏联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党及世界革命运动发展关系，与这些国家尤其是苏联领导人建立了特殊关系。鲁巴伊与伊斯梅尔联合执政期间，对外采取中立、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宪法规定，南也门支持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加强与进步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人民、社会主义国家及进步的爱好和平国家的关系，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同其他国家的相互关系。由于受解阵总书记伊斯梅尔指导思想的影响，南也门特别强调要加强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关系，尤其要全面发展与苏联的战略关系，

鲁巴伊主张全面准确地执行南也门的对外政策，也主张与苏联发展关系，但又认为，这不是南也门对外政策的一切，主张在优先发展与苏联关系的同时，也应与阿拉伯国家、中国及其他友好国家

发展关系。在公开讲话中,他常谈及南也门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既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也提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还有时只提兄弟的社会主义阵营。他主张南也门的对外关系要有自己的特色和独立性。鲁巴伊的这些主张充分体现在他的实践中,积极发展对华关系便是一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苏尖锐对立,关系恶化;苏联在南也门重点经营,大力渗透,影响很大,竭力挑拨中国与南也门关系;伊斯梅尔又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与苏联发展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鲁巴伊顶住压力,坚持对华友好,认为南也门与中国有相似的历史遭遇,都为争取和巩固独立进行了斗争,两国之间的共同语言很多;对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感到敬佩;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视,对中国支持南也门人民正义斗争所提供的巨大支持与援助给予高度评价。他一贯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在1971年的第27届联大上,南也门是要求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联合提案国之一。同时,鲁巴伊希望中国能向南也门提供更多的支持与援助,愿在建国进程中学习中国的经验。

中国政府特别是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南也门人民的正义斗争及与南也门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南也门人民早在进行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斗争时期,就得到了中国道义和物质上的援助。南也门一些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与中国有联系,1963~1964年,这些政党和组织曾派代表团访华。1964年1月,中国总工会代表团出席在开罗召开的国际工会声援亚丁工人和人民大会,明确表示坚决支持亚丁工人和人民的斗争。1965年,中国红十字会向南也门解阵提供物资援助,救济遭到英国飞机轰炸的南也门难民。1967年6月,解阵代表团访华。1967年10月至1968年4月,解阵一批干部在中国学习。1967年11月30日,南也门宣布独立的当天,周恩来总理致电南也门首任总统沙比,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陈毅副总理兼外长打电报给南也门外长,通知他中国决定承认南也门人民共和国。

1968年1月31日,中国与南也门建立了外交关系,建交协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黄华和南也门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阿瓦德在开罗签署,同年2月2日就建交事宜发表了新闻公报。新闻公报阐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政府根据各自国家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决定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互派外交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南也门人民共和国和它对全部领土及岛屿的主

权。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国政府一致同意遵照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1997年9月,我作为中国驻统一的也门共和国大使,在萨那不止一次与阿瓦德大使见面,此时他任也门驻华大使。我们一起回顾了昔日他与黄华大使签署中国与南也门建交公报的历史。

中国与南也门建交后,南也门首任外长扎莱于1968年9月访华,这是南也门独立后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个高级官方代表团。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代表团,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与扎莱外长签署了两国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政府向南也门提供了第一笔无息贷款,主要用于修建有利于南也门国计民生的工程项目。中国于1970年先后向南也门派出医疗队和农业、渔业、石油、五金等考察组。此后,中国向南也门提供的援建项目陆续上马。

1970年8月1~13日,鲁巴伊应中国政府邀请,率团访华,受到热情、友好、高规格的接待。周恩来总理亲往机场迎接,在从建国门外到迎宾馆的20多华里的大街上,数十万群众冒雨热烈欢迎鲁巴伊的访问。当周恩来总理陪同鲁巴伊乘坐的敞篷汽车到达天安门广场时,欢迎的气氛达到高潮,12个系着巨幅标语的大气球在广场上空迎风飘扬,一束束红色气球腾空而起,伴随着徐徐向前行驶的车队。在天安门两侧的观礼台上,数千名少年儿童手举彩色花束,组成了中文和阿文的“欢迎”字样。5000名文艺工作者跳起中国的丰收舞和南也门的腰鼓舞等舞蹈。周恩来总理和董必武副主席联合为鲁巴伊访华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毛主席会见了鲁巴伊及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以及随行人员一起照了相。毛主席同鲁巴伊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周恩来总理与鲁巴伊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周总理和鲁巴伊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中国向南也门提供优惠贷款,承建援助项目。鲁巴伊一行访问了北京、沈阳、南京、上海等城市,参观了工厂、农村和部队,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访问结束时,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此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鲁巴伊回亚丁后,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谈他访华观感。他热情赞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强调指出,他对中国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从中国革命中和中国

人民在各个发展阶段的革命经验中吸取教益，这是一次极富成效的访问。

1974年11月10~18日，鲁巴伊再次率团访华。当时周总理病重住院，董必武代主席年事已高，邓小平副总理代表周总理前往机场迎接鲁巴伊并主持以周恩来名义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邓小平说，中国和民主也门同属第三世界，两国人民在长期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鲁巴伊在讲话中热情赞颂民主也门和中国的友好关系。他说，我们两国虽然远隔重洋，但这并不妨碍加强和加深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两国在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中结成的战斗团结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毛主席也会见了鲁巴伊，对他再次访华表示热烈欢迎，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周总理在医院会见了鲁巴伊，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邓小平与鲁巴伊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就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会谈。双方对会谈的成果表示满意，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邓小平和鲁巴伊出席了签字仪式，中国再次向南也门提供优惠贷款。鲁巴伊在离京之前举行了盛大答谢宴会，在洋溢着热烈友好气氛的宴会上，鲁巴伊和邓小平先后讲话。鲁巴伊热烈祝贺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他说，民主也门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和合作的巩固与加强，将进一步增强两国之间的团结与合作。邓小平赞扬鲁巴伊访华取得圆满成功，为进一步增进双方的了解，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做出了新的贡献。邓小平说，鲁巴伊主席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讲了很多友好的话，这充分体现了兄弟的民主也门人民的友好感情，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一向认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相互支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同全世界人民、包括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他指出，第三世界各国休戚与共，更应该加强团结，相互支援，共同努力，争取新的胜利。鲁巴伊离开北京时，邓小平等前往北京车站热烈欢送。此后，鲁巴伊一行访问了林县、郑州、广州等地，参观了工厂、农村、水利设施，游览了名胜古迹，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友好接待。鲁巴伊结束访华时，发表了新闻公报。

在鲁巴伊执政时期，由于双方共同的努力，中国与南也门之间的友好合作不断发展。1976年，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毛主席相继逝世，鲁巴伊均致唁电，表示沉痛哀悼。1977年10月，中国交通部长叶飞率政府代表团访问南也门，鲁巴伊予以接

见，与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并授予他“十月十四日勋章”，这是南也门第一次将南也门最高勋章授予外宾。1978年4月，在鲁巴伊的亲自提议和安排下，南也门总理阿里·纳赛尔率团访华，获得中国政府提供的新贷款。在此期间，南也门内政、卫生、商业、外交、教育等部长先后访华，中国也有多起代表团访问南也门。中国完成了津吉巴尔大桥、长达485公里的艾因——木卡拉公路、94眼水井、纺织印染厂、枪弹厂、五金农具厂、盐场、6条捕鱼船和渔业冷库等援建项目。中国援建项目的投资占南也门三年计划(1971~1973年)投资总额的26%，占第一个五年计划(1974~1978年)的20%。中国向南也门派出了医疗队、教师组和乒乓球教练，并在军事领域进行合作。1978年，两国的贸易额达2180万美元，为1969年的6.8倍。

在鲁巴伊执政的9年间，南也门与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卫生、体育、教育、贸易等方面的友好合作均有很大发展，是两国关系史上最好的时期。

我于1977年7月到中国驻南也门使馆工作，与鲁巴伊接触的机会很多。在近1年的时间里，他曾多次接见中国大使，不止一次到中国援建的项目视察，并经常请中国医生为他的家人看病。在这些活动中，他曾多次点名要我当翻译。可能由于1968年我与他在萨那两次相见的缘故，我们每次见面都非常亲切。有时，他称我为兄弟；有时他到中国援建项目视察时正赶上用餐时间，中方负责人邀请他与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一道用餐，他也欣然接受，显得非常随便，有说有笑，问长问短，吃得津津有味；还有时他到中国医疗队工作的医院检查身体，便把随身带的手枪交给我暂时保管，并开玩笑说，我是他最信得过的兄弟。每逢节日，他让家人给在阿比洋工作的中国医疗队送去牛羊肉，派他的侍从人员给中国大使馆送来龙虾。他曾多次向我们谈及他两次访华的情景，言谈中流露出他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敬佩。一次，他对我说，他在进行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占领的武装斗争时经常读毛主席的书，受益匪浅，他访华时能有机会见到毛主席，是他一生最大的荣幸。他高度评价中国向南也门提供的巨大无私援助，赞扬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态度和高尚品质，认为中国是南也门的真正朋友。

鲁巴伊执政期间，非常重视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尤其与北也门改善和发展关系的国家。这一时期的南北也门关系在演变过程中虽遇到曲折，也发生过磨擦，但总的来说，南北关系有所改善，并在统一的道路上迈出了步伐。鲁巴伊与北也门共和委员会

主席埃里亚尼就南北统一问题多次举行会谈,达成了统一的十点协议。这一重要文件成为南北后来历次统一谈判的基础,也是双方实现合并的基础。1974年下年,鲁巴伊与北也门指挥委员会主席哈姆迪达成协议,双方继续推动南北统一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两元首的努力虽受到普遍赞扬,但也遭到反对派的非议和抵制。1977年10月,哈姆迪在访问亚丁前夕惨遭暗杀,鲁巴伊对这一事件感到震惊、悲痛和愤怒,伊斯梅尔却为之暗喜,苏联也在密切注视着南北也门的事态发展。

在鲁巴伊与伊斯梅尔联合执政过程中,发生了政见分歧和权势之争,逐渐形成两派。1970年后,两派矛盾日趋尖锐,在斗争中,苏联坚决支持伊斯梅尔,企图通过伊斯梅尔控制南也门。那时,苏联军事顾问团常驻南也门,团长为中将军衔。苏联驻南也门大使馆也是其驻中东地区最大使馆之一,大使一度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联在南也门的人员最多时达7000多人。南也门的大部分中高级军官都在苏联受训,军事学员保持在200名以上,武器装备基本靠苏联提供。此外,苏联还在莫斯科为南也门培训党务干部,在南也门办党校,派大批教员授课,建立文化中心,两国在新闻、广播、电视、通讯等方面都签有双边协定。苏联在南也门如此下大本钱,其目的是要控制南也门,为其与美国争夺霸权服务。鲁巴伊所推行的对华政策,同与苏有离心倾向的北也门政府发展关系,在内外政策上所表现出的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色彩,均不为莫斯科所容。南也门的鲁巴伊与北也门的加什米都被克格勃列入危险分子黑名单。

1978年,鲁巴伊与伊斯梅尔的矛盾公开化,亚丁街头巷尾都在议论、预测,南也门的政治舞台上将出现一场暴风雨。鲁巴伊预感到伊斯梅尔要搞掉他,便处处设防,并曾有过在必要时上山打游击的念头,但后来又认为时局不会发展到这一地步。为顾全大局,他愿做出让步。而伊斯梅尔却采取攻势,步步紧逼,在苏联的支持和策划下,已下定除掉鲁巴伊的决心,只等适当的时机。就在此时,南北也门关系中发生的一件偶然事件为苏联剪除鲁巴伊和加什米提供了良机。

1978年4月底,北也门原指挥委员会委员、伞兵司令阿里姆与加什米总统产生了尖锐矛盾,阿里姆率部下投奔南也门,被亚丁政权收留。加什米对此十分恼怒,决定派员与南也门领导人交涉。同年5月16日,加什米的私人代表侯姆朗抵亚丁与鲁巴伊等人交涉要人。鲁巴伊根据解阵总部会议决定,没有答应放人。这一事件既导致南北也门关系紧

张,也加剧了南也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伊斯梅尔和苏联克格勃抓住这一时机,策划于密室,炮制出了一个借刀杀人继而嫁祸于人的一箭双雕行动计划。

一切就绪后,伊斯梅尔派塔法里什以鲁巴伊的名义到北也门去见加什米,讨论有关阿里姆南逃事件,而鲁巴伊却丝毫不知此行内情。1978年6月24日,塔法里什手提公文包乘专机去萨那,从机场直奔加什米办公室,因是鲁巴伊总统特使,加什米的侍从警卫人员毫无戒心,对他的手提公文包也未做任何检查。早晨9时57分,塔法里什手提公文包大摇大摆地走进加什米办公室,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加什米握手,互致问候。两人坐定不到两分钟,塔法里什公文包中的定时炸弹即剧烈爆炸,塔法里什当场被炸死,加什米深受重伤,处于昏迷状态。警卫听到爆炸声后,立即冲进办公室,将加什米送往军人医院抢救。医务人员尽了最大努力,终因加什米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身亡。

事发后,北也门组织了调查委员会,对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进行了详细调查。南北也门合并后,南也门许多档案公开,加什米与鲁巴伊被害事件终于水落石出。1995年初我出任中国驻亚丁总领事后,一些经历过这一事件的也门朋友向我介绍了有关内幕情况。事实证明,两元首被害事件完全是伊斯梅尔与苏联克格勃共同策划的一个大阴谋。伊斯梅尔在实施这一阴谋的过程中,先把当时的内政部长萨利赫·卡赛姆变为自己的驯服工具。卡赛姆虽是鲁巴伊一手提拔起来的,但利欲熏心,忘恩负义,在伊斯梅尔的引诱下,秘密投靠了伊斯梅尔,充当了暗杀计划的具体执行者。

卡赛姆先是物色作案的合适人选,经过反复思考,最终选定了他的外甥马哈迪,绰号为塔法里什,时任内政部长办公室主任。塔法里什身患癌症,且已扩散,将不久于人世。1978年6月17日,卡赛姆给塔法里什写了封亲笔信,将此任务交给他去执行。信中说,塔法里什死期已近,与其死于癌症,不如为这件爱国之事壮烈而死,如能成功,死后将被追认为烈士,妻子和子女将会得到妥善安置,还可得到一笔可观的抚恤金。信中,卡赛姆再三交代此为绝密件,绝对不能让其他人看到信件和手迹。6月24日,塔法里什在写给卡赛姆的回信中说,我将赴萨那执行这项爱国任务,因为它是为也门革命和也门人民的统一事业服务的。如获成功,我将感到幸运。请把此事作为我为筹备建立新型先锋党而做的微薄贡献。我向您保证,我将欣然前往,愿意为自由与统一献身。

伊斯梅尔等人将杀害加什米的计划安排妥善后,又与鲁巴伊进行联系,说为了加强与北也门的关系,将派要员乘专机去萨那见加什米,该要员的绰号叫艾阿瓦尔,以主席特使的名义前往为妥。鲁巴伊不知内情,便同意了这一提议。同时,卡赛姆又以鲁巴伊的名义与萨那总统府通话,通知萨那有关鲁巴伊主席特使抵萨那的事宜,并要求萨那安排加什米接见。接着,卡赛姆从南也门航空公司调来一架专机,名义上是送鲁巴伊主席特使艾阿瓦尔去萨那执行任务,实际上,乘专机的是冒名顶替的假特使塔法里什。塔法里什上机前,卡赛姆将南也门情报局伙同苏联克格勃准备的装有定时炸弹的公文包交给了他,并让他服了镇定药。整个计划完全按预谋者的计划进行,加什米被炸身亡。

事发当天,北也门关闭了萨那机场,扣留南也门的机组人员和专机,宣布同南也门冻结关系,断绝一切来往。北也门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表声明,谴责亚丁的罪恶行径。6月24日晚和25日,南也门总统委员会和解阵中央连续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加什米死亡事件。伊斯梅尔派嫁祸于鲁巴伊,压鲁巴伊承担杀害加什米的全部责任,并迫其辞职。鲁巴伊坚决否认与杀害加什米事件有关,一再表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他拒绝与会,只通过联络员与伊斯梅尔等人进行谈判。

由于杀害加什米事件在南北也门和世界引起强烈反应,而伊斯梅尔与鲁巴伊在杀害加什米责任等问题上的谈判又陷入僵局,6月26日凌晨,双方开始火并。当时,鲁巴伊被软禁在海边山坡上的总统府,伊斯梅尔早有准备,占有优势,用飞机轰炸总统府,军舰封锁海面,出动坦克、装甲车向总统府进攻。鲁巴伊依靠总统府卫队进行反击。双方经过16小时激战,终因力量悬殊,鲁巴伊总统府被攻陷,他也被俘。当晚,鲁巴伊就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鲁巴伊死后,南也门当局把杀害加什米的全部罪责加在他身上,给他戴上“异端分子”、“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走狗”、“冒险主义者”等一大堆帽子。

这场政变发生时,我正在中国驻南也门使馆工作,对伊斯梅尔与鲁巴伊之间的矛盾有所了解。加什米身亡后,我们对南也门形势及南北也门关系的严峻性有清醒的认识,做好了应变准备。中国大使馆因离政变现场较远,没有受到炮火威胁,只听到飞机的轰炸声和机枪的对射声。我几次试图开车到街上了解情况,都被警察挡回。伊斯梅尔派早有部署,全城戒严。我们最担心的是中国医疗队和援助南也门的渔业组的同志们,因为他们的住所就在总

统府附近。事后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采取掩护、隐蔽措施,所有人员未受伤害,只有一些锅碗瓢盆被炮弹碎片或子弹打破。对整个事件过程及事后的事态发展,我们根据国内指示,严格执行我外交政策,不干涉内政。这一立场受到南也门人民的一致好评。至于后来伊斯梅尔有意冷淡与中国,并采取反华行动,责任完全不在中方。

加什米被炸死这一严重事件不仅震惊也门,在国际上也引起强烈反响,南也门为这一事件付出了巨大代价。应北也门政府要求,阿盟1978年7月1~2日在开罗召开外长级理事会紧急会议,研究加什米被害一事,17国外长或代表与会。阿盟理事会做出制裁南也门的5项决定:强烈谴责杀害加什米总统的罪恶行径;谴责所有策划和执行这一罪恶计划的参与者;冻结阿盟成员国同南也门的政治、外交关系;停止阿拉伯国家同南也门的经济文化关系以及对其提供的技术援助;待南也门政府尊重阿盟宪章时,阿盟理事会再重新考虑这些措施。阿盟自1945年成立以来,通过决议制裁一个成员国,这还是第一次。另外,加什米被害事件更直接冲击了南北也门关系,双方的紧张关系持续了一段时间。

伊斯梅尔靠苏联支持剪除鲁巴伊后,创建了南也门社会党,握有党、政、军最高权力和决策权,成为南也门的绝对权威。伊斯梅尔大权独揽后,对内独断专行,搞一言堂、家长制;对外进一步投靠苏联与东欧国家,使自己陷入内外交困的窘境。他执行的内外政策引起也门社会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导致决策层内出现严重政见分歧和激烈权势之争。1980年4月20日,伊斯梅尔被赶下台,赴莫斯科长期休养。1985年3月,伊斯梅尔从莫斯科回亚丁后,又积极串联,重整旧部,发展势力。同年10月,他重新进入南也门社会党政治局和党中央书记处,企图夺权。在1986年1月13日南也门社会党领导层一场火并中,伊斯梅尔中弹身亡。数年之后,他创建的南也门社会党逐渐衰落,本人也成为也门现代史上一位有争议的人物。

随着国际形势和南北也门时局的变化,也门南北于1990年5月22日宣布合并,实现统一。南北统一后,鲁巴伊被恢复名誉,1997年,被迫认为烈士,印度洋中的索科特拉岛上的一所学校也以鲁巴伊的名字命名。

我先后出任中国驻亚丁总领事和中国驻也门大使。其间,见到过很多昔日与鲁巴伊共事的老朋友,曾多次到鲁巴伊家乡参观访问。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深深感到,也门相当一部分人仍对鲁巴伊怀有思念之情。